

建立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提出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并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派出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与两省领导共同研究办特区的问题。考察组经过调查研究,确认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两省报告中所提的“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特区。“出口特区”成为特区的最初称呼。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会议同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特区”。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

策,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例如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中央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在海南建立特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特区建设的又一伟大实践。1980年6月和1983年4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和《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确定对海南实行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26日,中共海南省委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紧接着又批转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海南建省并成为继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建立后全

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4月,党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实践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不仅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在推进对外开放,引进境外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发挥了窗口作用、试验作用和排头兵的作用。

(晚报记者 王丽丽 整理)



段德昌(1904—1933)男,汉族,湖南省南县人,中共党员。



贺英(1886—1933)女,汉族,湖南省桑植县人。

1906年,贺英和丈夫组建起一支专与恶势力抗衡的地方武装。1916



赵一曼(1905—1936)女,汉族,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共党员。

赵一曼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

段德昌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州,先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1928年6月起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红军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930年2月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第2军团第6军副军长兼17师师长、第6军军长,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参与创建与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1931年4月任红3军(红2军团改编)第9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等战斗的胜利。同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1933年5月牺牲。

贺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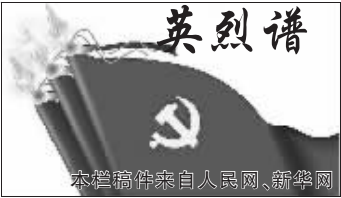
年,她支持贺龙杀死盘剥农民的桑植县大豪绅朱海珊,赶走贪赃枉法的知县陈慕功。1922年,丈夫被杀害后,她接过丈夫手中的枪,率领地方群众武装,抗官府、杀豪绅、打土匪、救穷人,开始了更加顽强的斗争。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湘鄂西组织群众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贺英得信后,即刻将群众武装1000多人的队伍交给贺龙、周逸群等,从此,她参加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并参加了桑植起义。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部退

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十分艰难。她自己几次负伤,但仍多方筹措,亲自带游击队,给工农革命军送棉花、棉布、银元和子弹。1929年10月,红军在庄耳坪战斗失利,她率游击队去战地作善后工作。1930年春,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贺英率游击队留在湘鄂边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坚持游击战争。1932年反“围剿”后,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四面包围根据地,贺英率部苦苦坚持。1933年5月5日深夜,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包围,战斗中,贺英中弹壮烈牺牲。

赵一曼

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和看守

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迫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年仅31岁。



淮阳专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至1953年,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淮阳专区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领导下,在1950年11月至1953年1月期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彻底肃清了我区残留的反革命分子,为实施土地改革扫清了道路,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反革命分子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凶焰高涨。他们网罗反动封建势力积极组织地下军和地下政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党和人民政权发起进攻。反革命分子在我区活动猖狂,严重干扰了我区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工作的开展,已对人民政府和人民大众构成极大威胁。

淮阳专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两年有余,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1950年11月10日,河南省委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淮阳地委按照省委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全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公安、检察、司法机关通力合作,重点打击匪首、恶霸及证据确凿的特务和解放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到1951年2月底,全区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2632人。经过全力镇压,敌人的嚣张气焰遭到了迎头痛击,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1951年3月以后,地委根据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

要求各县委发动群众,把运动引向深入。从1951年6月中旬起,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淮阳专区决定将镇压反革命运动加以收缩,集中力量进行清理积案工作。1951年6月至10月,由于淮阳专区正确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末期谨慎收缩的方针,一些干部群众中曾发生过的“左”倾情绪和工作中的某些草率从事现象得到纠正。

经过第一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残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但还没有彻底肃清。1952年1月至1953年1月,全区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重点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巩固城乡治安。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运动是淮阳专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保卫国家,保卫人民政权的热情空前高涨,社会面貌也焕然一新,公共秩序安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晚报记者 王晨 整理)

